

导论 民间高等教育投资：一个跨学科的问题

一、问题

从 1968 年法国学潮到 1998 年 10 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围绕高等教育扩展的激烈争论持续了 30 年。虽然曾出现过克拉克·克尔所描述的 70 年代那种“高等教育界的忧虑心情”^①，但本世纪的后 50 年将作为高等教育最壮观的发展时期载入高等教育史册：全世界的大学生入学人数增加了五倍多，从 1960 年的 1300 万增至 1995 年的 8200 万^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文件指出，“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对高等教育需求空前高涨，高等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对高等教育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和在为建设未来而赋予青年一代以新的技能、知识及思想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日益提高”^③。正如布鲁贝克所说，“……无数的青年人逐渐觉得上大学是一种责任。这一发展倾向与 20 世纪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发展的趋势是相一致的，后者导致各种各样的新职业纷纷出现。对美国青年（尤其是少数民族）来说，

〔美〕Clark Kerr 著 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 第 2 页。

②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教育参考资料》，1999 年 第 3 期 第 2 页。

同上书 第 1 页。

高等教育取代西部边疆而成为他们的机会之乡”^①。

20世纪90年代中期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尤其是最近几年如日中天的“新经济”使全世界的人们对高等教育寄予前所未有的期望。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空前的扩展压力，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国民最优先的需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目标已经被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确定了下来。

然而最近几十年世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却与政府支持力度降低同时发生了。尽管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但高等教育面临的经费困难丝毫没有降低。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所说：“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处于危机之中，虽然就学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国家的支助能力下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方面的差距本来就很大，现在又在进一步扩大”^②。为缓解经费的困难，各国高等教育都在积极寻求各种经费来源，高等教育如何和从哪里获得资金、获得资金将会使高等教育自身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虽然有2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改变，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与公共高等教育投资能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穷国”不仅表现在我国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更体现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

①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主编：《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② 支助即支持和资助、帮助，这是近年世界性高等教育文件中普遍使用的词汇。

③ “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教育参考资料》，1999年，第3期，第1页。

较小 这就使得财政性高等教育投资面临更多困难。“大教育”之“大”表现为受教育的人口多 更在于办“整个教育体系”三级教育 全由政府包办 于是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

但也必须看到，虽然我国整体不富裕，经过改革开放 20 年的发展 民间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济力量，“穷国”如果能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加上政府公共高等教育投资的增加 就可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需求。“大教育”如果能实现“大家办”，“大”就不再是一种困难。政府没能力也没必要包揽整个教育 把一部分教育剥离政府投资体系 利用民间力量办学 或者“官民分担”使政府负担的“大教育”缩小 就可以解决“办大教育”的困难。在现阶段 调动民间高等教育投资 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无疑是解决“穷国办大教育”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出路。

正是因为如此，扩大民间高等教育投资，运用多种投资来源，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这不仅成为近期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从经济方面讨论着运用民间力量扩大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经济贡献，探讨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产业模式。

但教育是培养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对高等教育投资单纯从经济方面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不能不关注它带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影响。民间高等教育投资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人，投资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否则难以调动投资积极性 运用民间投资扩大高等教育 会对社会方方面面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 只有从教育与社会的广阔视角 放到大的社会背景和多学科范围里 探讨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基础和带来的影响 才能为我国利用民间投资扩大高等教育的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论文选择了这样一个需要多学科研究的教育问题。

二、方法

对扩大民间高等教育投资这样一个涉及广泛社会关系的问题，从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一个教育问题，单纯经济研究显然是不够的。王伟廉教授认为，“在教育领域中，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问题的解决其功夫不在教育之内而在教育之外。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教育研究只是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要靠跨学科研究”^①。

伯顿·克拉克也认为，“在有选择地探索高等教育的复杂现实的过程中在当前求助于若干最有关系的学科和它们所提出与运用的一些观点，有很大的好处。多种不同的分析专业便是一些可供认识的方法，是使分析家更有知识同时又更加无知的实力通道。一个有启发作用的观点就像戏院里的聚光灯，当用强烈光线照射舞台前方的某些动作时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动作上，同时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边缘的地位。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 所有灯光都照射 眼睛往整个舞台前后漫游。但是学科的观点是非用不可的，因为我们正是在专家所发展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高等教育的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 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

^① 王伟廉：“试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跨学科研究”，《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 第2期 第21-24页。

法 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①。

高等教育学甚至整个教育学都是在利用其他学科知识研究教育问题中形成的 如果没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也就不会有教育学。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通常都是运用相应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从不同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中产生的“;这各种学科都有适宜我们挪用之处,只要加上‘教育’这个前缀词即可”^②。因此,对于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教育问题,就需要利用多学科的知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维视野的研究。就学科本身而言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学科 从其他学科广泛地借鉴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如迪尔凯姆所说“;毫无疑问 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 要想取得进步 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学科 将这些学科中宝贵的经验弃之不用 显然是很不明智的”^③。

论文选择的跨学科研究就是要尝试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对一个复杂的教育问题进行全面的应用研究。论文选择了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这样几个不同的学科视角,运用有关理论与方法 探讨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动力基础 分析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广泛影响,最终要为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① [美]伯顿·R·克拉克著 戴王承绪主译:《高等教育新论》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第2页。

② [美]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利》北京 三联书店,1997年 第44页。

③ 迪尔凯姆著 胡伟译:《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华夏出版社,1988年 第118页。

三、内 容

论文题目中的“民间”等同于“非政府”的概念。教育投资 (educational investment) 亦称“教育投入”是指社会和个人直接、间接投入教育领域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高等教育投资”是指向高等教育领域直接、间接投入人力、物力的活动。包括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行的投资和为提供高等教育进行的投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指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间高等教育投资进行研究。

民间高等教育投资首先面临的是与大学理想、价值的整合问题。高等教育自身的理想和价值选择决定了其对民间投资的容纳程度，而高等教育的外部价值影响了民间主体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选择。决定了民间投资的动力。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最后实现是两者价值选择相统一的结果。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哲学分析，探讨了这样的两种理想和价值，分析了对冲突进行整合的途径与方法。

现代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经济属性，无论提供还是接受高等教育，都可以作为一种投资行为进行经济分析。投资的动力基础是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率决定于投入的成本和所获得收益的比较。无论成本还是收益，都是与价格密切相关的。而高等教育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于一般商品或劳务。受高等教育的产品、产品属性、成本与成本分担影响。论文的经济学分析部分从高等教育的产品、产品属性的分析入手，揭示高等教育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而分析了投资的收益，探讨了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决策机制。

民间高等教育投资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里，受需要和动机驱动的，而作为结果又对社会心理带来广泛的

影响 研究民间高等教育投资中的心理活动 是认识和把握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基础。论文的心理分析，探讨了民间高等教育投资带来的心理满足及其社会动机 分析了决策的心理 研究了我国文化和民族性格对当前扩大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影响，以及教育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

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影响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在人口控制、社会劳动就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还对社会平等和效率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推动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动力。民间高等教育投资也必将会对社会流动、劳动就业、社会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产生影响。论文的社会学分析部分，主要探讨了民间高等教育投资与劳动力迁移和就业、社会分层与流动、家庭人口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高等教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等教育投资建立在利益基础上 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和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 体现了政治权力，反映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政治权利。高等教育通过传播政治思想、培养政治人才和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影响政治行为 通过教学活动影响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社会化；政治体制有关的国家、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政治意识、政治的民主化都需要高等教育的支持。论文的政治学分析 运用政治学中利益、权力、权利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影响。

我国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政策选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论文的教育政策分析部分探讨了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营利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关系 分析了高等教育产业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选择 讨论了民办高校的自由竞争与政策约束问题。

第一章 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哲学分析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它（大学）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

——阿什比 (Eric Ashby)

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 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 使今天的人们甚至难以设想十几年、几十年后的社会生活。在迎来新世纪的时候 回眸千年社会变迁 得以传承并稳定保留下来的社会组织并不多，大学似乎是一个鲜明的例外。如果以中世纪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为起点 大学已经有了 700多年的历史 它的职能、规模、课程、培养方式等与初创时期迥然不同 但几乎所有大学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了某种中世纪大学的组织与传统，使各国的大学既有共同之处 又各具特色^①。正如哈佛大学一位前校长所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 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 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②。

引导着各国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维系大学精神

顾明远：“大学的理想与市场经济”，《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 第2期

^②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 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第27页

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大学的理想。这样一种理想集中反映了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它是如此的坚定，以至于在历史上无论是帝王还是教皇，也无论是政治压力还是经济诱惑，可以影响却都无法使大学放弃自己的基本理想。哈罗德·珀金指出，“自 12 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到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副其实来保持自己的活力”^①。大学的理想维持了大学的传统，而不断完善自己合法存在的基础以适应变化的世界，又给予大学生生命力的源泉，“大学这一动力站是——或至少经过一段时间滞差后——能够使自己适应社会对更多、更合适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人员的需要”^②。理想与现实的整合表现为高等教育传统与变革的统一，由此形成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动力。

民间高等教育投资首先面临的是与大学理想、价值观的整合问题，这本质体现了高等教育的哲学选择。高等教育自身的理想和价值选择决定了其对民间投资的容纳程度，高等教育对外部主体的价值影响了民间主体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动力，决定了民间投资的可能性。民间高等教育投资的最后实现是两者价值选择相统一的结果。本章第一节探讨了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第二节研究了不同高等教育哲学的选择与办学经费来源的关系，第三节则把高等教育视为一个满足外部主体需要的客体，分析了外

〔美〕哈罗德·珀金著 载王承绪主译：《高等教育新论》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第 22 页。

② 同上书 第 23 页

部主体的价值取向对高等教育办学经费来源的影响。

第一节 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

历史上关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讨论是围绕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大学区别于社会其他机构的本质特征、大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二是大学应当把培养理性的人作为目标还是以有用性为目的，即要造就全人还是要因应情景的改变而合于人类的需要。这本质反映的是知识的价值、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问题。知识价值观要求大学以高深学问为自己的生命基础，以追求真理为自己终生的目标。这样的使命使大学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机构。大学从形成那一天开始，就把对人的重视作为自己的目的。希望自己的努力能使人发现和完善自己的理性；大学的发展是与其服务社会、引导社会、改造社会分不开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批判、推动社会进步是其当然的历史使命。知识价值、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形成了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布鲁贝克 (Brubacher, J. S.) 将其区分为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前者建立在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真理的忠诚上，后者以服务社会发展为基本目的。概括 700 年的历史和当今面临的挑战，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高深学问

在大学形成以来的 700 多年里，如果说有什么永恒特征的话，那首先当推以高深学问为自己探究和工作的对象，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使大学得以形成并最终与职业培训机构相分离。建立在对人

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无尽好奇基础上的高深学问探究活动，由于“只有越来越精确的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逐渐形成了忠于真理、坚持客观性原则、探索未知世界的大学精神。所谓的“价值自由”、“价值中立”又衍生出了西方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基本传统。

现代社会更把深奥知识的理智探索作为大学这一社会组织的基本使命，“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究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与它可能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毫不相干”^①。当代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都把高深学问作为大学的基本特征，布鲁贝克把“高深学问”作为其著名《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克拉克把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组织系统研究的基础，认为“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②。珀金认为，“一切文明社会都需要有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来满足它们探求知识奥妙的需要，同时它们也为知识的拥有者和探索者提供各种所需要的

^①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 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第12页。

[美]伯顿·R·克拉克著 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第11页。

条件”^①。

然而 高深学问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大学的象征 大学首先是作为职业培训机构在中世纪出现的。大学的前身或者说雏形是 11、12 世纪的教会学校和城市学校，虽然这些学校的师生都是牧师 但他们的目的却都是世俗的 都是为了满足人口日益增长并且日益城市化的社会需要。中世纪是一个行会的时代，最初的大学就是教学的行会 随着作为行会的大学的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逐渐与职业教育分道扬镳 这不仅在形式上 更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

大学与其他专业训练学校显著不同的是它的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首先 神学部、法学部和医学部这些研究生水平的专业学部共同构成了大学的主体（这也是三科以上才能冠名为大学的历史传统的渊源）其次 这些高级的专业课程是设在七艺共同课程之上的，七艺分成本科生或学徒学习的三艺 以及学士或工匠学习的四科。在教学上这些大学已经明显体现出以当时的高深学问为主要内容 确立了以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信念和模式 并一直影响到现代大学。

高深学问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不提供直接的职业训练 但在中世纪及其以后的相当时期里 高深学问学习与探究活动的结果却使学习者在职业发展中具有了更有利的地位。作为大学教育基础的“七艺”教育尤其是文学部似乎最少功利性和职业性，但“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可能不再继续就学，文学部为他们在读写、

〔美〕哈罗德·珀金著 戴王承绪主译：《高等教育新论》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 第 24 页

辩论、思维、计算、量法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提供的有用训练使他们适于承担教会和世俗政府中的种种职业”，在那样一个时代，“雄辩家是公众舆论的领袖，是公民思想的塑造者，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兴衰”；以辩论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个个能言善辩，学生们正是依靠这种本事在布道、法庭听证和政府讨论中崭露头角的^①。显然，大学以高深学问学习与探究为基本特征、从职业教育中脱离出来并得到更大的发展，本质上是因为大学的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比当时其他职业训练培养的人才更适应时代的要求。虽然存在教会与政府的二元权力结构，但“不过教会也好，国家也好，都不能不依靠大学的服务和它培养出来的人才生存发展”。所以，有用性虽然不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却作为结果奠定了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这样一种高等教育哲学获得了最大成功，作为一种信念与模式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12世纪只有4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帕尔马、波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到14世纪发展到了16所，15世纪再添14所，16世纪又增加了28所，达到58所。这些大学虽然分布在几乎整个欧洲，但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教授七艺，师生来自世界（当时欧洲所能认识的世界各地，是真正‘世界性’的机构），使用拉丁语教授三门研究生水平的学科，存在极其密切的跨校和跨国的学科联系^②。

17、18世纪在宗教与世俗的斗争中，传统大学高深学问的理念走向腐朽，尤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它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而

^① [美] 哈罗德·珀金著，载王承绪主译：《高等教育新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7-28页。

不是有学问的人认为“大学毕业生有绅士般的教养比有高深的学识更重要”。18世纪后一批新的大学迅速形成，从苏格兰的大学到德国新大学，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把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信念推到了极致。柏林大学把高深学问作为大学理想体现得如此纯粹，以致于医学教授不允许去看病人，工程学之类的技术科目在19世纪末之前不能列入大学课程，因而只得在专科学校教授。以第一任哲学教授黑格尔为代表的柏林学者们忠实体现了中世纪大学的高深学问理想。像化学界的李比希、实验心理领域的冯特、历史学界的郎克等大师确立了德国大学世界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

德国大学“纯学术”的理想在美国变成了“纯科学”的概念，“赠地大学”开创了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要的市场模式，但并没有排斥高深学问的哲学，美国人同样认为一所学院除非有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专门用于研究，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大学。一方面1862年“莫里尔法案”后的大学和学院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任何方面教学的机构”；另一方面187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研究生院。竞争迫使美国著名的大学迅速设立或改进自己的研究生院，形成了美国大学的双层体制：一是“学院”或本科生阶层，从事的是高深知识应用为主的教学活动；二是“大学”或研究生阶层，继续以只适合于少数英才的高深学问为学习和探究的对象。

美国的模式形成了高深学问探究与应用两个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高深知识的研究是应用的前提，应用的需要又成为推动研究的重要力量，目前这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大学“高深学问”的理想与特征在这里被作出了现实主义的时代诠释。

二、心智训练的自由教育

中世纪大学从当时众多的职业教育机构中独立出来，它不再进行直接的职业培训，而是给学生以心智的训练。由此使学生成为具有人文素养和思辨能力的人才。从中世纪开始，虽几经社会变迁，大学这样一种以人文为基本精神的心智训练传统始终受到重视，形成大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它以发展完善人格、培养广博学识与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为主旨，通过关于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全部学问的理解与把握来实现这样的理想。

这样一种“自由教育”的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最初只有无需做工谋生、能够全力过市民生活的“自由人”和从事国家管理的人才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因而只能是对少数人的。牛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中将自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这样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有价值的人远比教给学生某种技能更为重要，培养人的理性应是大学的根本目的，通过最有利于学生心智训练的课程的学习，可以塑造完善人格，形成能够迁移到几乎一切方面的能力。

按照这样的逻辑，高等教育应是一种不受社会支配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教育，是一种为了“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有用性的教育。虽然作为培养全面发展、有价值的人的结果，高等教育可以为国家、教会或企业服务，但这种教育的目标并不以此为条件，有用性并不是学生真正的、最大的财富；有用性即使是重要的，也不过是一种副产品^①。正像卢梭所说，在使爱弥儿成为一名军

^①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他先要使他成为一个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商人、企业主或专家”教育使一个人成为有能力、有理智的人，他们以后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会满足他们自己。

心智训练科目的稳定性来自这样的一种假设：人的理性在各个历史时代都是相同的。正如赫钦斯所说，“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知识，知识就是真理。真理是任何地方都相同的”^①。同样，专门用来训练思维的“七艺”在现代社会也和在一历史上一样都是课程的基础，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不需要人们知道怎样精确地说写（文法）、合理地思考（逻辑）和令人信服地表达思想（修辞）的时代。

中世纪大学是通过这样的心智训练课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从12世纪到16世纪得到了巨大的成功，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的这样一种理念。但到16世纪这种建立在七艺和神学部教育基础上的教育模式逐渐失去吸引力。英格兰那些保守的大学逐渐沦落为少人问津的机构。表现在统治了英国高等教育几个世纪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走向衰落。

18世纪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开拓了新型的教学与研究结合的办学模式。在开设新学科方面也走在了前面。在某种程度上它有资格讲是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地。柏林大学的诞生，新的教学科研模式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但洪堡仍然把大学看成是社会的道德灵魂，“不是要确保掌握这种或那种知识，而是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确保记忆力受到锻炼，理智力得到提高，判断力得到纠

^① [美] 约翰·S·布鲁贝克著 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第78页

正道德感情得以升华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为从事任何专业——它是出于自由的意愿和为了专业本身的理由，而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须的技能、自由和能力^①。

19世纪的《耶鲁学院 1828 年报告》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思想 它把传统的课程作为“训练”和“装备”心灵的课程；学生通过训练相应的能力和官能进而发展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又能按照人的意志从一个学科迁移到另外一种学科，从一般的学习迁移到生活中的各种职业。因此在耶鲁的教授们看来，要求未来的律师学习物理学或要求未来的牧师学习圆锥曲线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因为哲学学科都是通向心灵的训练^②，有什么学习能比一个受过良好训练并因此能将其力量移向任何方面的心灵更为实用的呢？^②

19世纪科学主义在西方兴起，并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得到充分发展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迅速上升 此后便与人文主义在高校分庭抗礼 前者面向个人发展 重学识与修养 后者面向社会发展 重科技与职业。两者虽相互消长 然而人文教育却始终稳居“各科基础”之宝座 似不能不归因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巨大惯性及其内在的合理成分。

建立在人文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大学观认为，高等教育办学的力量来自于大学体系本身的内部逻辑，不受社会需求和青年求学压力的影响。由于并非多数人适合接受这样的训练，因而高等教

〔美〕哈罗德·珀金著 戴王 承绪主译：《高等教育新论》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第 35页。

② 〔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第 5页。